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 辑尹继佐 周山主编 援-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圆园园园

摇陈丹 苑圆园园 苑圆园园 苑圆园园

摇 I 援中 援魏 援 II 援 ①尹 援 ②周 援魏 援 III 援学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国 援 IV 援圆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圆园园园号

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

主摇摇编 :尹继佐摇周摇山

责任编辑 :华摇华

封面设计 :闵摇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远园弄 苑号 摇电话 缘园园园 摇邮编 圆园园园)

经摇摇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印摇摇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摇摇本 :愿园伊园园 摇员 摇圆

印摇摇张 :员缘 摇圆

字摇摇数 :源圆 摇千 摇字

版摇摇次 :圆园园园年 员月第 员版 摇圆园园园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圆园园员-圆园园册

陈丹 苑圆园园 苑圆园园 苑圆园园 · 愿摇定价 圆园园元

版权所有 摇摇翻印必究

目摇摇录

别样眼光看历史.....	尹继佐摇员
——关于中国学术思潮兴衰研究的思考(代序)	

上摇编摇学术思潮成因论

第一章摇先秦子学思潮的成因.....	猿
一、外因之一 领主经济大崩溃	源
二、外因之二 动荡的诸侯政治	圆
三、内因之一 士阶层的形成与转向	圆
四、内因之二 学术发展的逻辑必然	猿
第二章摇西汉经学思潮成因分析	源
一、西汉建立前的百家之学概观	源
二、西汉创建时的政治经济形势	缘
三、西汉初期对诸家学说的随机混用	远
四、“独尊儒术”的艰难选择	远
第三章摇汉末名教危机与玄学的兴起	愿
一、汉代名教之治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论证	愿
二、“孝治天下”及其弊端	愿
三、东汉末年的名教危机	愿
四、由潜流成为明流的道家	愿
五、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与魏晋玄学的产生	愿

六、正始玄学的崛起	圆缘
第四章摇隋唐佛学兴盛缘由探析	圆愿
一、六朝佛学的持续勃兴与人才的聚集是隋唐佛学繁荣的基础	圆愿
二、外缘的增上是隋唐佛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圆猿
三、结语	圆员
第五章摇儒学更新的必然性及其途径	圆猿
一、儒学的命运	圆猿
二、佛学与道学	圆远
三、思想整合	圆缘
第六章摇明代心学思潮生成的历史境遇	圆缘
一、深层基因 :明施政“合理性”分析	圆缘
二、源与流 :旧思潮取向分析	圆员
三、历史机缘 :新思潮成因分析	圆愿
第七章摇清代朴学思潮的成因	圆怨
一、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与否定理学末流的救世精神相呼应	圆园
二、清政府实行怀柔与高压并行的文化政策胁迫学问由经世之用转向考据之实	圆象
三、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东汉以降训诂、考据学的积累为朴学兴起疏通了道路	圆圆
四、康乾朝的盛世气象为朴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	圆员
第八章摇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	圆圆

一、多元学术思潮 新旧学术思想的转型	猿猿
二、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内因	猿猿
三、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外缘	猿猿
四、各种学术思潮崛起的原因	猿猿

下摇编摇学术思潮衰亡论

第九章摇先秦子学思潮衰亡的原因	猿猿
一、游学、养士土壤的消失	猿猿
二、荀、韩文化政策取得主导地位	猿猿
三、子学本身的缺陷	猿猿
第十章摇两汉经学思潮的衰落	猿猿
一、战乱对汉代经学的摧残	猿猿
二、郑学和王学对经学的“综合”及互争	猿猿
三、经学博士的师法分化	猿猿
四、“便辞巧说”泛滥成灾	猿猿
五、经学教化的变味	猿猿
六、经学趋向迷信	猿猿
七、经学对封建政权的依赖性	猿猿
第十一章摇玄学思潮的消退	猿猿
一、郭象的逍遥义为玄学发展划上句号	猿猿
二、高僧支道林对逍遥义的超越	猿猿
三、佛教的理论优势导致喧宾夺主	猿猿
第十二章摇晚唐佛教义学宗派的衰落	猿猿
一、内因与外缘的双重打击使天台宗走向式微	猿猿
二、法相宗衰落的原因	猿猿
三、从“十玄门”理论的发展进程看华严宗的衰落	猿猿

四、禅宗 :佛学思潮衰退中的异军突起	源蒙
第十三章 理学衰变	源园
一、理学独尊的确立	源园
二、理学走向僵化	源远
三、理学式微的内在原因	源怨
第十四章 明代心学思潮由盛而衰的历史境遇	源愿
一、心学与朝政 :互动分析	源愿
二、心学的衰落 :原因分析	源怨
第十五章 清代朴学思潮衰落的原因	源苑
一、从现实批判精神的丢失到远离社会实践而死寂	源苑
二、学隐之风不合变革的社会主题	源园
三、学术缺陷造就的当然结局	源愿
主要参考书目	源源
后摇记	源愿

别样眼光看历史

——关于中国学术思潮兴衰研究的思考

（代序）

摇摇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学术思潮兴衰原因的专论，作者试图用别样眼光看待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

—

中华民族以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卓然于世界民族之林，灿烂的华夏文化一直为炎黄子孙引以为豪。尤其自《周易》诞生以来的三千年，中国学术界思潮迭起，正是这些学术思潮的涌动，推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以哲学为主干的中国学术思想，是华夏文化的理性积累。对这种理性积累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和评判研究，还是最近八九十年的事情。前四十年，得西学风气之先的中国学人，由于过份依赖于用西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解剖的工具，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不免有牵强比附的毛病，以及“宏阔”有余、“精耕”不足等缺憾。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侯外庐先生等率先编著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所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所著内容比较详细，然而教条、偏激的研究风气，影响了对众多历史人物及其学术价值的准确评判；同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断代学术史、专业思想史研究的不充分，很难深刻揭示中国学术史的脉络走向。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将老子思想置于战国中期加以分析，将《周易》置于战国

末期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加以评判。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残简、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荆州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从海外购回的大量战国初、中期竹简的整理等,不断地推翻以往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旧见,而80年代以来各专业史研究的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不仅著述丰硕,研究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大多能够运用中西学术比较的手段进行现代文化意识的阐述。但是,如何在个别思潮史和专业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历史时期发生的主流学术思潮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考察研究,从学术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中探寻其逻辑演进的必然性,进而从学术思潮的发展中总结和把握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目前的学术界还着力甚少。

中国学术史,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的地位。如何将这一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魅力的学术史准确生动地描述出来并介绍给全人类,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学术思潮是学术史的主流、思想史的灵魂、时代的精神。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应以中国学术思潮的研究为基础。这一研究不仅能为各专业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整体性的文化视野,而且能为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内容。

二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思潮,出现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春秋末期。当被中原人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周边部落纷纷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以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得到了各边缘文化的补充,也有了更快速的发展。尤其随着周朝领主经济的崩溃,地主经济的形成,人们对周天子的“君权神授”产生怀疑,引发了人世间的“礼崩乐坏”,导致各种社会思潮、学术

思想的空前活跃,拉开了子学思潮的帷幕。由于厚积之故,思潮气势之恢宏、学术队伍之庞大、涉及内容之广泛、理论研究之深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思潮激荡的三百年时间里,形成了儒家、道家、名家、墨家、法家等众多学派,产生了一大批原创性学术著作,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充沛的底气。但是,由于各家学说均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各学派之间,而且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少观点分歧,其分歧之大甚至造成学术队伍分裂;同时,由于秦嬴政的一统天下,不仅诸侯时代的游学养士土壤消失,“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得以实施,历时三百年的子学思潮遂戛然而止。

然而,文化专制未能保障政治专制,秦王朝二世而亡。“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推翻秦政权的是农民和武夫。汉王朝建立之后,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一度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学术界气氛宽松。实践证明,黄老之术不可长用,汉武帝便采用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曾被秦始皇又烧又坑的儒学,一跃成为官学,儒学典籍成为学者谋取功名利禄的资本,疏解儒学原始文本,便成为儒士的唯一功课。虽说只此一家,热衷于注疏、学习儒学原典的人数,远甚于先秦百家。被认为已经读懂某部经书的博士虽仅十数人,然而每一博士的门徒弟子,往往多达数千人乃至上万人。这批挂在某一经师门下而由政府出资供养的太学生,达数万人之众。而自费啃经书,企盼有朝一日也能跻身太学的儒生,更不知有多少。狂热的经学研究,将儒家原始文本研究推向极至。经学研究,挡不住利禄的诱惑,从繁琐渐渐转为抱残守缺、经学派系间的互争相残;“经世致用”渐渐变为迂腐守旧,甚至将经学引向神秘迷信,世俗的孔子成为顶礼膜拜的神灵。由于经学的命运与政治紧紧地捆在一起,当腐朽的东汉王朝灭亡时,已经徒有其表的经学也同时衰亡。经学思潮历程三百多年,其成果则仅限于儒学典籍研究,与子学思潮的丰硕成果不能同日而语。

经学思潮衰落时,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即玄学思潮,开始酝酿形成。西汉初期风光一时的黄老之学,由于“独尊儒术”的经学思潮的崛起而淡出学术界。不料三百年之后,由于儒家礼教即“名教”的日益虚伪而为人们所厌弃,崇尚“自然”即真情实感的老庄哲学,又重光学术界。以王弼为旗手的一大批学者,援道入儒,倡言“名教本于自然”,自然是本,名教是末;本为体、无,末为用、有。为已遭世人轻蔑的名教重新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围绕本末、有无、体用等哲学问题,魏晋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由此形成了一股极具思辨色彩的玄学思潮。这一思潮历经王弼的儒道调和、嵇康的儒道对立、向秀和郭象的儒道合一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得到“名教即自然”的结论,而为学术界普遍认同。

玄学思潮盛行仅仅半个世纪,这与先前的各绵延三百年的子学思潮、经学思潮相比,不免太过短命。然而,思潮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时间长短来评判。时至今日,人们一提及玄学思潮,仍会油然而生敬意,魏晋玄学大师们师法自然的风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亮丽一景。

尽管玄学为名教的存在找到了自然合理性,却并未能解决人们最关心的社会危机、阶级矛盾与精神困苦。就在这时候,一个比玄学更有魅力的理论——佛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源自印度的佛教,早在汉代甚至战国时,便已传入中国;在玄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名士与名僧之间交游频繁,用玄学讲解佛学,风靡一时。

佛学与玄学握手言欢未久,由于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立马将玄学挤兑出局,开始了独立发展的历程。佛学替代玄学,自有必然性。其一,佛教抓住了人们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问题,宣称能够普渡众生。其二,佛教关于无明作业、业报轮回的基本教义,非常适合剥削阶级的利益。其三,佛教没有民族宗教的狭隘性,而具有相当的宽容性。其四,佛教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有一个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系统——因明,而这正是先秦子学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短缺。佛学思潮至隋唐达到高峰,并形成诸多宗派,其间

最具影响的有天台、法相、华严等三大宗派。三大宗派都很注重佛学理论的研究,在刻意“求真”的同时,却丢掉了学术研究中最可贵的东西——创新。随着理论研究的日臻完善,其生命力日益衰微。一向息影山林默默无闻的禅宗,由于不拘泥于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顿悟之路,终于一枝独秀,称雄佛坛。“不立文字”的禅宗崛起,敲响了隋唐佛学思潮的丧钟。

我们不必为又一个学术思潮的消退而沮丧,中国学术界永远不会寂寞。佛学思潮刚刚退去,儒学的改造更新运动接踵而至。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因为佛学的张扬而放弃本土文化。尤其始于隋而盛于唐的科举取士制度,深深吸引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隋唐科举首重诗赋,以致唐诗盛极一时,大诗人多为高官。深受刺激的儒士们,从佛学思潮的衰落中觉悟出一个道理:只有改造更新、与时俱进,儒学才能长盛不衰。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在汲取佛、道诸教精义基础上的儒学更新运动,在“理学”的旗帜下蓬勃展开。经过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家的整合与更新,儒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被后人称之为“新儒学”。儒学获得了学术的新生,理学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尤其到了明代,朱姓皇帝从同姓的朱熹那里找到了文化依托,把崇尚程朱理学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国策,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准绳。探讨理论、更新儒学的理学思潮,至此已成一潭死水。与理学争锋的心学思潮,便高举着批判的旗帜,跃上学术舞台。

早在理学兴盛时期,心学便已萌芽;“鹅湖之会”即是一例。随着理学思潮的由盛而衰,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心学思潮,终于在王阳明的推动下蔚为壮观地出现在学术界。从“存天理,灭人欲”,到“致良知”,心学体系日益圆满;情景设教、诗歌习礼的传教方法,激发了儒生的学习兴趣和追随热情。在明代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心学思潮激荡着中国学术界。即便科举取士仍以程朱理学为准绳,多数举子的思想仍明显趋向阳明心学:“科举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日知录》卷十八)明代后期,

为安抚广大信奉心学的儒生,朝廷不得不为遭受“伪学邪说”之毁的王阳明平反,并将他请进孔庙,享受与朱熹一样的礼遇。这一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潮,由于经常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始终受到来自理学方面的攻击;由于心学内部论学同异而派系纷立;由于在社会动荡时多数传人缺少社会责任感而以心学研究作为避风港等诸多原因,在高潮百余年之后,渐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满族入主中原的事实,逼使汉族知识分子反思:无论是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明天理”,还是心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都存在着问题。他们怀着明道救世的精神,决心“务本原之学”。于是,朴学这一具有新内容、新形式的学术思潮,扑面而来。开朴学风气的第一代学者,都是明朝遗儒,多为抗清志士。他们既有学术方面的追求,更有经世致用的壮怀。面对朴学思潮的兴起,颇有远见的满清统治者采用了因势利导的文化政策,凭藉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编撰规划越做越大,如《古今图书集成》一项,达一万卷一亿字;《四库全书》一项,达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于是,朴学由民间转入庙堂,许多达官、富商,也纷纷创办学堂经舍,主持编撰书籍。朴学思潮风靡朝野,朴学研究在学术界独占鳌头。

充满书卷气息的朴学思潮持续了二百年,直到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大门轰开,八国联军恣意蹂躏大清御花园时,朴学后继者才蓦然发现,已经烦琐迂腐的朴学,到了穷途末路。国门洞开,八面来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崇尚演绎的西洋哲学、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学说,蜂拥而入,与本土的新儒家研究等学术流派,汇聚成一股多元学术思潮,涌动于灾难深重的华夏大地。其间,以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很快独领风骚,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欣赏、追随、改造、发展。伴随着这一学术思潮的快速推进,短短半个世纪,国家政权屡经更迭,社会制度也实现了由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多次飞跃。近、现代的多元学术思潮,已经历时百年,但是从以往各学术思潮的发展规律而

言,还仅仅处于思潮的第一阶段,可能再过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思潮的全部历程;其真正的学术成就,尚未显山露水;迄今为止所提出或正在探索的种种理论问题,或许要在这一思潮终结之时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便由这些彼伏此起的学术思潮连缀而成。

三

当我们淡化“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观念,以学术思潮作为时代的旗帜,构架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合理性,即前后相序的学术思潮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性,这是以天灾人祸为基础、用血腥杀戮取而代之的王朝更迭所没有的。尽管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利用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胜的关系,创造出“五德终始说”,为封建政权的更迭寻找天然合理性,但是这种牵强比附的历史循环论,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只是为以后的讖纬迷信提供方便,只能给社会秩序添乱。

当我们将这些学术思潮连缀成一条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链,就会看到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原来是一个富于理想和追求、充满理性和智慧的历史,而每一个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都体现着知识群体对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人格的终极关怀。

关于各学术思潮兴衰原因的分析,是学术思潮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学术思潮研究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我们的中国学术思潮史研究,便从这里开始。本书中的十五篇文章,是我们探索思潮兴衰原因的初步尝试,内容遍及八个主流学术思潮。由于每人各主一个思潮,研究对象各有特点,研究方法未尽一致,研究程度也深浅不一。因为是尝试,不便遽然定于一尊,尽量保持了各篇原貌,请学界同好批评。

中国学术思潮史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以后,我们还

感遥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

打算继续出版专论。真诚地期待学术界的同好对我们的研究提出批评,也欢迎有志于这一研究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尹继佐

圆年 怨月 圆日

上摇摇编

学术思潮成因论

第一章 先秦子学思潮的成因

“先秦”这一概念，下限时间是清楚的，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上限时间，则有不同说法。一种是统括秦以前的上古时期，亦即上溯至夏代乃至更远古的时期。一种是以周天子赐封秦国为上限，亦即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离开镐城，将国都东迁至洛邑（秦）襄公护驾有功，赐之岐西之地，封爵诸侯，始建秦国。相对于嬴政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历经五百五十年的诸侯秦国，即称先秦，先秦恰好包括春秋（公元前 771 年至公元前 476 年）、战国（公元前 476 年至公元前 221 年）两个历史时期，因此，先秦时期亦称春秋战国时期；因春秋时期亦称东周时期，故先秦时期又称周秦时期；先秦、周秦、春秋战国，异名而同实。

本文所谓“先秦”取后一种说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历经夏、商、西周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各种学术思想第一次显露出峥嵘的面目，伴随历史新局面的开始，由萌动而喷涌，汇合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学术思潮。这一股与整个社会大变革极为相称的学术思潮，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历时最长久、学术成果最丰硕、学术质量最高因而影响最深远的学术思潮。历时最长久，是因为这股思潮从春秋末期正式拉开帷幕，至战国末期戛然消亡，整整经历三百年时间。成果最丰硕，是因为学派纷呈，著述丰富，历经秦始皇焚书、楚霸王火烧秦宫之后，汉朝人仍然收集到了先秦时期的一百八十九家著作，共计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因此，后人用“百家争鸣”来概括这一学术思潮。学术质量最高，是因为

这些学者都以独特的思想促动思潮的形成,推进思潮的发展,他们的著作都具有高智慧和原创性的特点,不仅使得这股思潮保持了长达三百年的激荡之势,并且对尔后二千二百年的华夏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一直起着深刻的规范影响作用。中国后来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学术思潮的涌动,几乎都是以这些原创著作作为母本,从这些原创著作中汲取营养,围绕着这些原创著作展开的学术论争。

这些留下了原创性著作的学者,被尊称为“子”,他们的著述,被称为“子学”,这一股激荡了三百年之久的学术思潮,也便称为“子学思潮”。

子学思潮虽然发轫于春秋末期,高扬于战国中期,终结于战国末期,但是它的萌芽,却在春秋早、中期。因此,探究子学思潮的萌发原因,也需从春秋早、中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变动及其学术文化的自身发展中去寻觅和梳理。

一、外因之一:领主经济大崩溃

在中国,土地始终扮演着一个神奇魔术师的角色。19世纪中叶,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上溯三千年,同样是一场“土地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并且由此引发了一个历时久远的学术思潮。原因无他,三千年前与三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商周时代,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的崇拜,可以从商代最具权威的经典——古代三易之一的《归藏》一书得到佐证。所谓“古代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相传《连山》著作于夏代,《归藏》著作于商代,《周易》著作于周代。这三部经典均以六十四卦为主体,其中《连